

主持人语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于2018年4月12日，承担着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功能和对外交流四项使命。所谓人才培养，就是招收和培育跨学科和交叉型的高素质博士研究生，以满足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首批博士生为直博生，从优秀本科毕业生中招收，研究方向为中东研究、俄罗斯和中亚研究。为此，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于2018年7月6日公布了“2018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的通知。

截至7月27日报名止，研究院一共收到248份申报材料。申请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专业包括外语、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人文与社会学科。依据学习成绩、专业排名、科研工作、所获奖励等要素，研究院从中选拔出35名学生赴北大参加夏令营活动。8月28—31日，夏令营活动在北京大学静园五院举行。28日报到，29日举行开营仪式和四场专题讲座，30日全天根据讲座的内容分组讨论，31日上午举行笔试和结业式。

鉴于专题讲座对于夏令营活动的举办和优秀营员的选拔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院经过慎重考虑，按照中东、俄罗斯和中亚研究方向的要求，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兼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吴冰冰四位知名专家学者，分别以《中亚的战略格局与一带一路》《谈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塑造》《中东安全问题和中东地区治理》《中东地区战略格局中的伊朗》为主题进行讲座。

参加夏令营的学员们普遍反映，四位重量级专家精心准备的四场讲座，使他们极大地开拓了眼界，加深了对俄罗斯、中亚和中东问题的了解，丰富了对一带一路、国家形象塑造、安全与治理、战略格局等理论与现状问题的认知。经过三天的学习，通过分组讨论和笔试的考察环节，研究院最终从35名学员中遴选出6名优秀营员，作为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第一批直博生。

王锁劳

2018年9月15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2018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8 月 28 日—31 日

为更好地加强全国优秀大学生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了解,搭建青年学子和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知名专家之间的互动平台,8 月 28 日至 31 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北京大学举办“2018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 35 名优秀大学生参加了此次夏令营。

29 日上午,开营仪式在北京大学静园五院举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主持,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历史学教授钱乘旦发表开营致辞。

钱乘旦院长首先对学员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表示,区域国别研究并不是新的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一些著名的国际性高等学府成立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所,这些机构中出了很多著名的学者,也产生了很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中国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其实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只是没有正式地采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专门的术语,也没有将它看作是有自己的特征且具有相关学术关联性的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在对外研究方面有非常强大的师资队伍,也一直在研究国外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相关的问题,然而,这些研究力量分散在不同院系和学科,没能形成合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大学于今年 4 月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以期整合相关学科力量,推动北大区域国别研究发展。

钱院长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学科领域,而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从理科到文科,从社会学科到人文学科的所有学科,同时做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人又必须有一个特定的领域,即在非常广阔的知识背景基础之上又对某个方面特别精通。因此,希望有志投身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同学既要培育非常广阔的知识储备体系,又要树立坚定的信念,成为相关领域的一流专家。当中国有了这样一大批人才的时候,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就能走到世界的前沿。希望大家通过此次夏令营,能够了解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

本理念，了解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基本情况，感受研究院浓厚的学术氛围与优质的教学资源，同时欢迎大家有朝一日进入北京大学，成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第一批学生。

开营仪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王林聪，北京大学卡塔尔国中东研究讲席教授吴冰冰四位学者就中亚、俄罗斯和中东问题分别作学术专题讲座，并与营员现场互动答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报告题目为《中亚的战略格局与一带一路》。

据介绍，中亚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概念，区域涵盖原苏联的五个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五国相继独立成为目前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克曼斯坦。中亚五国总面积约 400 万平方公里，现有总人口约 7000 万。该地区北邻俄罗斯，南接伊朗和阿富汗，向西隔里海与阿塞拜疆相望，东邻中国，与中国有 3000 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五国均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其中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双内陆”国家。尽管五国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且在文化传统上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彼此差异非常大，特别是独立以后各国发展的差距越来越明显，比如哈萨克斯坦 2017 年人均 GDP 比中国还要高，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国力非常弱，人口也非常少。

孙壮志表示，中亚国家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战略地位。首先，它是东亚文明、南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三大古文明的交汇处，在这一地区生活着 130 多个民族，而在每一个国家的主要民族中，也存在着很多部族和分支，民族关系非常复杂。此外，该地区宗教众多，有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犹太教，并且各宗教中教派多样，比如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大概有十几个教派。可以说，中亚国家既有同一性，即都是穆斯林国家，在伊斯兰化的进程中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较为近似，但同时许多方面也体现出独特性，其中文化的差异在中亚表现的非常明显，民族间、宗教间的矛盾也非常复杂，特别是这些国家独立后，要强化主体民族意识，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民族矛盾。历史上中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进程，一是突厥化，二是伊斯兰化。突厥化和中国有关，历史上唐朝灭了东、西突厥后，突厥开始西迁，中亚逐渐突厥化；伊斯兰化则与当时阿拉伯帝国占领此处有关。

中亚的主体民族形成较晚，其中塔吉克民族形成于 10 世纪的萨曼王朝，哈萨克民族、乌兹别克民族、吉尔吉斯民族陆续形成于 16 世纪之后。

对中亚战略重要性的描述，一般都会提到麦金德的“陆心论”，但实际上，最早发现中亚战略地位的是中国，历史上张骞通西域就体现了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此后，中亚的重要性还与周边帝国的相继崛起有关，比如帖木儿帝国的后裔通过中亚到阿富汗，之后征服南亚，建立莫卧儿帝国，再比如苏联甚至更早的沙俄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大游戏”，都表明该地区是近代以来地缘政治博弈非常激烈的地方。此外，中亚又是欧亚大陆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从中国经中亚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到欧洲要比之前通过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到欧洲的距离近很多，在陆路交通方面中亚这座亚欧大陆桥被寄予很大希望。

孙壮志指出，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中亚国家相继独立，它们首先面临着确立体制及发展道路的任务，急需实现政治经济的转型。然而，在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困难，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被沙俄吞并前，这些国家大多为封建汗国或者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非常小的国家，因此在独立后，巩固政权、建设国家体制的任务非常繁重。

从政治形势上看，中亚五国独立后确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权体制和决策方式，保证了国内的稳定和有序。五国普遍确立了总统制政体，只有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因国内政治斗争激烈一度改为议会制。五国都实行多党制，但政党的作用被严重弱化。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现任总统的执政时间都很长，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两次非正常的政权更迭，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首任总统突然病逝后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

在国家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中亚国家也面临着一些隐患。尽管从中亚国家的社会基础来看，维护中央政权特别是总统个人的权威是适合的，也能为中亚社会所接受，对巩固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也有益处，但目前来看，政权本身的缺陷和权力斗争的激化不断破坏政局的稳定，官员的腐败和民生的凋敝，也导致社会上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中亚国家的政权结构不断调整，立法体制经常变化，甚至宪法也可以随意修改。此外，总统个人权力过大，家族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政权，压制其他政治派别，容易导致政治纷争走向极端。一些客观因素也给中亚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挑战：首先，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困问题严重，其次，中

亚国家独立后坚持世俗化的政治制度，而下层则出现了伊斯兰教迅速复兴的状况，极端势力对中亚国家来说是现政权的最大敌人。此外，中亚地区外部环境复杂，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受多重因素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目前已成为中亚地区政治上的“新热点”，各种政治矛盾集中爆发，动荡局面至今仍在延续。

经济改革是中亚国家独立后面临的另一项重大任务。由于各国资源禀赋较好，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中亚五国经历了约 10 年的稳定发展，经济都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特别是能源储量丰富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情况较好。但同时，由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受大国影响，各国外汇市场开放较早，与西方金融机构联系较多，自 1997 年以来，多次国际金融危机也给中亚国家的金融体制带来重创，特别是 2008 年下半年后，中亚五国经济陆续感受到外部环境恶化带来的巨大压力，尽管都出台了旨在刺激增长、增加就业的反危机计划或措施，但效果不甚明显。随着严重通货膨胀的出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多。

近两年来，中亚国家经济增长较为稳定。有统计表明，2018 年上半年，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速达 7.2%，土库曼斯坦为 6.2%，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增速也都超过了 4%。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7 年哈萨克斯坦 GDP 为 15554.1 亿美元，在纳入统计的全球 200 个国家中排名第 55 位；吉尔吉斯斯坦 75.65 亿美元，排在第 145 位；乌兹别克斯坦 487 亿美元，排名第 85 位；土库曼斯坦 423.6 亿美元，排名第 88 位；塔吉克斯坦 71.5 亿美元，排名第 147 位。

孙壮志认为，目前中亚各国经济领域问题依然突出：投资环境差，国内市场发育不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短期内难以改善；经济结构畸形，对外依赖严重，资金不足，债务负担沉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限，主要靠能源和原料输出，外贸逆差不断扩大。

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中亚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也非常多，包括传统安全挑战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其中非传统安全威胁最突出的是来自阿富汗的毒品走私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三股势力”的问题仍然很严重，生态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在有的国家也已是非常紧迫的问题。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最大特征是，它们多为跨国的地区性问题，对中亚各国的稳定造成普遍危害。

另外，“阿富汗综合症”问题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也有重要影响。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阿富汗内战的升级和塔利班的崛起给中亚的稳定带来直接的冲击，随着美国和北约宣布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形势的未来走向牵动着相邻的中亚国家的神经，他们担心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撤军后，阿富汗会再现军阀混战的一幕，而使美国 10 年清剿“劳而无功”的塔利班，则有可能再度尝试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政权。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由此被拉近。孙壮志表示，古代丝绸之路中，中亚是中国与欧洲主要的陆路联系通道，解决好中亚问题，丝绸之路就畅通，因此未来中亚地区的稳定和“一带一路”的推进有着重要关系。应该注意到，中亚地区是大国博弈非常激烈的地方，特别是近年来该地区能源资源开发热度不减，其在国际能源供应市场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今后能源优势到底会使地区各国繁荣稳定还是引发更激烈的矛盾，取决于大国关系的互动和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

中亚的国际格局具有大国主导的特点，已经建立的区域组织和出台的合作计划由不同大国推动，相互竞争，相互针对，展开地缘政治博弈。总体上看，当前中亚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各国努力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以稳定促进经济的增长。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反映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引发一系列新矛盾。三是中亚国家面对的外部压力空前增大，安全挑战明显增多，最主要、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阿富汗，间接的有来自大国的激烈竞争、西亚南亚的局势变化、国际市场的影响等。四是国际合作的矛盾性凸显，新机制又遇到旧问题。在中亚，各种各样的国际机制都试图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某些领域取得进展，但计划的最终落实面临很多难题。

中亚国家独立后，奉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西北边境的军事压力，改善了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但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中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矛盾波及中国新疆，一些外部的反华势力利用中亚地区破坏中国的统一和稳定。由于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复杂及可能出现的变数，中亚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产生了直接影响。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多个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双边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建立了上合组织、亚信机制等合

作平台，此外，双方在农业、旅游、环保等领域也尝试开展相关合作。

孙壮志指出，中亚战略格局的变化，给中国西部边界安全和西北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其中有利的方面包括：双边合作达到较高水平；互为优先合作对象；执法安全领域的跨国合作有了新进展；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等框架下地区反恐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利的方面包括：中亚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中亚的地缘政治裂痕扩大；西方的渗透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和安全互信；分裂势力难以彻底铲除。

自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亚国家纷纷表示出极大兴趣。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演讲中指出，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具备历史传统优势、地缘文化优势、政治法律优势，得到各国人民广泛支持和赞同。中国将中亚地区视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地区和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规划对接，共同寻找合作切入点，不断提高合作水平。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共同推进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孙壮志表示，希望中国能借助“一带一路”推动与中亚地区的友好关系，拓宽双方合作领域，加深各国民众间的交往与互信。

第二场学术报告主讲人是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授，主题为《谈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塑造》。在约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宁琦教授通过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国家思想，以及其在国内外采取的不同手段等方面的分析，讲解了俄罗斯如何塑造国家形象。

据介绍，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地理疆域，蕴含着极高价值的自然资源，同时又是一个以饱经创伤来改变社会状态、改变集权主义的地方。历史上，俄罗斯一直是由单一的独裁者统一全国并执掌政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作为支撑。在这样一个帝国中，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并通过东正教等意识形态使机构合法化，这种权力机构已经超越了语言和种族的界限，将统治者神话。从这个过程看，历史上的俄国其实更像一个帝国。有趣的是，俄罗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当它和其他国家交战时，永远觉得自己是被欺负的，但在每一次“被欺负”之后其领土和疆域都扩大了，由此可以看出其民族个性中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成分。从文化角度看，19世纪以前俄罗斯民族并没有广义上的民族特征，其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的农奴，由于教育的不普

及，其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可谓纸上谈兵。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以东正教为主要宗教的俄国依据新教的模式建立了军事、政府与商业机构，其贵族文化则依据天主教的模式建立。

宁琦指出，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和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也即自我认定与他人认知。国家形象反映的是对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评价，它不仅会影响到本民族每个个体对国家共同体的认知认同，从而影响到民族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归属感，而且也会复杂地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于这个国家的政府、民众以及所有该国的精神信息和物质产品的接受和评价，从而决定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和影响力，深刻地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影响着国家的政策走向，也影响着社会公众的认知。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形象作为一种主观印象，实际上构成了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心里预设。负面的国家形象会使人对该国及其民众所有相关信息和行为的认知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带有一种敌对型和排斥性，甚至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正面的国家形象往往使人愿意用更为理解、亲和、易接纳的方式对待该国和民众，形成正面的预设。如果要纠正负面预设，往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因此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本国形象的塑造。

据介绍，国家形象塑造分内在认定和外部认知，在对自我身份的探索方面，直到19世纪，俄国人才开始普遍意识到其拥有独特的民族特征——一个可以根据种族、语言等非宗教标准来定义的特征。这个时常感到困惑的民族开始寻找他们在现代世界的位置——一个能与其所占有的广袤疆域相称的位置。对民族特征的寻找产生于19世纪知识界的争论，也带来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直至今日这种寻找似乎仍未停歇。

俄罗斯从社会和心理角度对自我身份进行探索，其内因是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成功地激发了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共同的爱国热情，戏剧性地改变了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包括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普希金创作的大量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标志着俄罗斯生活与历史的全面复苏。此外，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的文化追忆最终还催生了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以说，从这场战争开始，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从外部因素

看，彼得大帝的改革与叶卡捷琳娜将欧洲文明加速带到俄国，使俄罗斯与西方联系日益加深，加之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人们愈发渴望明确界定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与此同时，因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影响的俄罗斯年轻一代找不到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实现个人理想的有效途径，便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伟大思想的思考者。至 19 世纪后期，民族主义思想在俄国崛起，特别是新的大众社会与城市新闻业的发展使这个多民族帝国产生了世俗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此后，民族主义使俄罗斯在其内部推行俄罗斯化，同时它产生了泛亚洲、泛斯拉夫的扩张梦想，希望国家变的强大。但不幸的是，俄国在 1904 年和 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败，在此后的一战中又输给了德国，沙文主义由盛而衰，帝国过度扩张的脆弱性凸显，导致了当时俄国国内一系列的革命，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宁琦认为，德国浪漫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起到了思想引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伟大的思考者们终于觉得自己找到了武器。

进入 20 世纪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当时的社会动荡，使俄罗斯在 20 世纪前 20 年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探寻深化到了对最基本的政治合理性的探索。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渐进性的变化，一开始是想依赖于上层统治，自上而下地寻求政治的合理性，因此在沙皇统治的最后时期，他们选择的是一种试图超越政治、避免政治的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化与宗教的观点。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俄罗斯的思想能够中和欧洲在各不相同的民族环境当中发展出来的所有的思想，而在俄罗斯的人民性当中，或许所有这些思想当中敌对的成分都能找到和解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索洛维约夫希望为俄罗斯寻找一种和平的精神上的身份，这种身份将使俄罗斯在世界上扮演一种非暴力的非政治的角色；比尔加耶夫在这个信念当中加入了民族主义的成分，提出了另外一种俄罗斯思想，他将俄罗斯描绘成一个具有极端矛盾特征的国家：专制统治与无政府主义同在，极端沙文主义与对本国感到极度困窘并存，人们表面上对统治当局一味屈从，而内心深处却拥有着无限的精神自由。比尔加耶夫当时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够激发出俄罗斯人的阳刚之气，他认为俄罗斯民族的精髓在于那些富有创造性思想家和艺术家在精神上进行的探索，俄罗斯人本质上应该是朝圣者，是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流浪汉，俄罗斯广袤的土地给予他们灵感，但又使他们陷入了无秩序的状态。将俄罗斯从各种痛苦经

历史当中解脱出来的途径，超越了地理的范畴，进入了历史的层次，所以俄罗斯是肩负着上天所赋予的使命的，并有着最终的基督教的命运，不是普遍的忏悔和解，而是更具民族性的，相信俄罗斯社会能够以某种方式变得比目前任何基督教国家都更有活力。与此同时，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一种新的方式肯定了那些被异化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核心观点，告诉他们历史注定向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倘若社会精英投身革命，则有可能将这最终的追求变为现实，于是他们就革命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俄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俄国出现了长达 80 年的苏联。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对政治合理性的探寻是社会学和反宗教的观点，他们完全相信政治措施，而且这样的一些政治措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了后来为苏联政权提供合法依据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吸引了大批相信人类具有完美性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邀请。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人们在思考自身政治合理性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新观点，他们既希望努力在文化和宗教上有所支撑，又能够在社会学和反宗教的观点当中获得灵活性。特别是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大量战后的西方信息材料解禁，使当时的苏联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之心更为迫切，他们接触到了久已禁止的一些宗教和文化的遗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个人肩负的责任，恰逢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出现了，之后 1991 年发生了 819 事件，在这个事件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离开了他在政坛上的位置，随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12 月 26 日当时的苏维埃最高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解体，俄罗斯作为苏联最大的遗产继承国，成为了独立的俄罗斯联邦。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需要加速寻找新的国家身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它重拾了在一战时期所产生的欧亚主义，其实这本质上是关于俄罗斯身份的一个地理构想，它表达了俄罗斯知识界某种模糊的渴望，希望俄罗斯能够还原其昔日的帝国身份，另外从其地理位置来说，它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但俄罗斯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这会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受益，因为当它地处欧亚之间时，它在地缘政治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既可以有亚洲的朋友，也可以向欧洲靠拢。

作为继承了大部分苏联遗产的新国家，俄罗斯究竟继承了什么？据宁琦介绍，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多民族国家，人口 1.4 亿，居世界第七位，地理位置位于欧洲的东部和亚洲的北部，境内居住着 130 多个民族，有 45 个土著少数民族，

俄罗斯国土面积为 1700 万平方公里，跨 11 个时区，共有 89 个联邦主体，是多宗教的国家，东正教是其最重要的宗教，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和天主教在其境内也有大量信徒。从边界看，俄罗斯南北宽东西狭长，整个边境线总长度达到 6 万多公里，海岸线 38000 多公里，大陆线 14500 多公里，其与中国的边境线超过 4000 公里。

宁琦认为，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代表了俄罗斯性格中冲突和矛盾的特点：隐忍又奔放；冲动又善于反省；世故但在很多事上又很纯粹；懒散但有勤奋的一面；看起来顺从，内心对自由的渴望比谁都强烈；行为野蛮，却拥有丰富的文化瑰宝；在东西方摇摆的同时，对自己却足够忠诚；觉得自己成长苦难，却视自我为世界的救赎者……俄罗斯东正教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民族性格当中沉淀，成为一种固化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民族共性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双头鹰的意向既表示纵横东西，也表示极度的矛盾和难以琢磨，也正是因为难以琢磨，我们必须从其民族和文化性格当中去了解这个国家，而当俄罗斯需要自我突破时，其必然要塑造正面的形象。

普京执政以来高度重视国家形象问题，努力塑造正面积极的俄罗斯形象。特别是 2014 年之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克里米亚的回归导致西方制裁，俄罗斯亟待突破困境。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借助在其国内举办的两大国际顶级体育赛事重塑国家形象。首先是 2014 年的索契冬奥会，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可以说普京是将自己的政治前途都压在冬奥会上，希望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形象。在主办冬奥会过程中，普京亲任“大使”亲力亲为，比如钦定索契为奥运主办地；特意在索契接待来访的五国元首；专门到酒吧会见同性恋运动员，与他们拥抱、热情交谈。索契冬奥会其实是俄罗斯体育的一个强国梦，为了梦想能够真正照进现实，俄罗斯举国上下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在各个领域都彰显了其回归的野心和雄心。比如在冬奥火炬传递期间，俄罗斯宇航员携火炬走出舱门进行太空行走，实现奥运会火炬首次外太空传递，这一壮举视为了告诉世界俄罗斯拥有最强大的外太空实力。冬奥会为俄罗斯承载了非常多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场运动会，而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走向强盛的俄罗斯。

随后，宁琦教授播放了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相关视频短片，其中对俄罗斯悠久的历史文明及俄罗斯梦进行了全面展示。宁琦表示，当人们在观看开幕式时，

并不仅仅感受到是一场体育赛事，而更像是一场文化艺术盛宴，其要表达的核心理念在于要证明俄罗斯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野蛮、低俗、愚昧、无知的国家，而是一个充满民族智慧和力量的国家。在那届冬奥会上，俄罗斯赢得了奖牌榜第一名，在自己的国土上实现了体育梦想。

索契冬奥会之后，俄罗斯迎来的第二场重大国际体育赛事——2018 年足球世界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外界对俄罗斯主办世界杯有方方面面的评价，但毫无疑问的是，本届世界杯上，俄罗斯再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国家形象的正面宣传任务。特别是在世界杯筹备的最后阶段，俄罗斯遭遇西方的经济制裁，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有条不紊的筹备各项赛事工作，展现出非常高水平的组织能力。世界杯期间的足球外交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非常成功的，比赛期间，普京在赛场内外接待了数十位前来观赛的国家元首及各国政府代表，仅在 15 日决赛的赛场上，普京就与 14 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一场豪华的足球外交。在宣传方面，俄罗斯推出了一系列宣传海报，其中一张的主角是前苏联足球运动员列夫雅辛，他是俄罗斯唯一赢得金球奖的门将，并在 1960 年率领前苏联赢得过欧洲杯。海报通过俄罗斯独有的艺术风格及色彩搭配，将历史投射到当下，寓意 1960 年的盛景会浮现在今天的世界杯赛场上。

俄罗斯世界杯的赛事组织赢得了各国媒体的如潮好评，由于赛事跨越 11 个城市，俄罗斯官方推出了包括球迷身份证、签证简化等便利政策，此外，或许是因为外界对其期望值较低，赛事的顺利进行也令各方较为满意，加之俄罗斯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优异，也为此次赛事增色不少。

最后，宁琦教授对如何塑造国家形象提出了思考问题，并指出国家形象的塑造更重要的在于文明文化的传播，而非金钱的打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王林聪的报告题目为《中东安全问题和中东地区治理》。

王林聪介绍说，动荡和冲突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突出特征，甚至是一种常态。从全球角度看，中东地区是全球安全体系中最大的也是最突出的一块短板。无数的政界学界的精英都在考虑如何补齐这块短板，但实际上很难，并且在全球化时代，中东的安全问题也波及全球。

中东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文化、政治和历史范畴，这个特点实际上

源于欧洲中心论。在欧洲人眼里，特别是在欧洲殖民主义时代，他们以自己为中心，以距离远近划分出近东、中东和远东，中国、日本包括印度以东一般都称之为远东，而在欧洲跟远东之间的区域笼统上被称之为中东。从地域上看，中东地区是指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区域，通常包括西亚地区和非洲的东北部国家，包括埃及，有时也涵盖苏丹，这是狭义上的中东。广义上的中东是指西亚和北非国家，基本上西起阿富汗，东边到土耳其，北至北非，一直到埃及、苏丹以及整个的阿拉伯半岛。

王林聪指出，安全从概念上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主观上不存在担心外来攻击的恐惧感，二是客观上不存在外来攻击的状态或现实，就是既没有危险又不受威胁。安全是人类社会的首要价值，对安全的认知有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做过分析，比如马斯洛在需求层次中就将安全需求看作是满足生存需求之后的首要需求，生存需求跟安全需求同等重要。从安全的层次上看，从大到小主要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及个人安全，其中人的安全是安全的核心，也是现代安全所强调的重要理念。从类型上看，安全通常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以及信息网络安全等等，实际上是指在不同领域中存在的或者是要确立的安全以及要解决的安全问题。在明确上述概念后，如何实现安全就涉及不同的安全观。安全观是基于对安全和安全威胁的认知与判断，即如何认识和感受安全，如何应对安全威胁，以及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提出的安全思维和采取的对策。安全观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安全感，即追求绝对安全。它往往以自身的绝对安全为基础，甚至是以牺牲他者的安全来维护本国的安全。近年来美国在许多领域提出的关于安全的设想，都体现了这种以零和博弈为特点的绝对安全观。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安全观”，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提出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等概念。这里要特别强调共同安全，也就是普遍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全球化指的是个人的安全问题有可能会变成他人甚至扩散至全体的安全问题，普遍安全日趋重要。此外，安全必须是可持续的，是有依托的、有保障的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包容的；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基于不同的安全观，各国在历史上形成过不同的安全机制，包括区域安全、集体安全、联盟安全等，现在则更多地强调共同安全，打造安全共同体。实际上中国

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人类的安全共同体。

王林聪认为，通常情况下有两类问题构成了对安全的威胁，一类是传统安全问题，另一类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问题通常以军事战争的形态出现，非传统安全是冷战后，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非常突出的表现形态，主要体现在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金融领域的安全威胁，生态气候变化导致的安全威胁以及网络信息的安全威胁，这些安全问题已经从个体上升到国家层面，甚至对整个人类的威胁也相当大。

由以上几方面可知，中东安全的内涵包括中东地区、国家和民众的安全。中东的安全问题是指中东安全的主体即中东国家及民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或者威胁，以及维护这种安全利益遭遇的障碍和挑战。尽管相关概念比较明晰，但在西方学者眼中，他们长期以来将中东安全理解为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从而变成要维护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免受威胁。因此无论是美国的中东战略还是英法等国的中东战略，都带有同样的目标，即阻止中东地区出现强大的国家，维护对中东地区及其石油资源的控制，管控中东地区的冲突。这种安全视角实际上是忽略了真正意义上的中东安全问题，由此造成了长期以来中东安全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是美苏较量的主要阵地，阿以争端是中东安全的主要问题。1990 年至 2010 年中东地区安全问题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成为焦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损害了中东安全结构，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2010 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席卷中东，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中东地区在安全领域存在严重“赤字”，一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日俱增，对中东安全局势构成重大挑战；二是地缘利益争夺导致中东秩序失衡，局部战争频发；三是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人口安全和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和难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着中东地区的稳定。当前中东安全问题的新现象和新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时恶化，二是政治安全问题凸显，成为中东安全的焦点，三是中东安全问题趋于多样化，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泛滥，生态安全困境日益严峻，社会安全问题更加复杂，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加剧，青年失业率走高。与此同时，教派、族群矛盾也给中东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突出表现为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斯兰国兴起，在“肢

解”伊拉克的同时又催生了中东地区的库尔德民族“独立”问题。

王林聪表示，中东安全问题的根源包含国际、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从国际层面看，由于中东地区自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不存在核心大国，该地区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域外力量主导或左右中东地区国际秩序以及地区利益造成了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动荡不宁，这个根本性因素可以概括为外部性。从地区层面看，中东国家间矛盾冲突不断激化，这之中既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曾经产生的历史积怨，也有巴以冲突、叙利亚战争等冲突。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内部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社会和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催生了民族分离主义、分裂主义和部落主义。

当前中东安全问题的困境也表现在三个层面。从国内层面看，中东国家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不确定性加深了中东国家内部的安全困境。政治、社会转型中各种矛盾集中释放或爆发，形成了对内部安全的全面冲击。从地区层面看，首先，国家间纷争持续至今、难以解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不相让的“死结”；其次，中东变局导致中东秩序剧烈变动，加深了安全困境。中东秩序的重塑，新一轮地缘政治较量空前激烈，中东各国不同程度地卷入，形成新的安全困境；第三，一些中东国家基于传统安全观制定针锋相对的安全战略，强化了地区安全困境，如以色列奉行“进攻型传统安全观”，伊朗奉行“防御型传统安全观”，沙特阿拉伯奉行“对外依赖型传统安全观”等。从国际层面看，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长期对峙，没有真正推进中东和平与稳定，他们的争夺激化了中东的矛盾，也对中东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此外，域外大国跟中东国家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导致一些中东国家原有的安全秩序遭到摧毁。

中东安全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目前中东国家整体上缺乏切实的治理途径，没有明确的治理目标，更缺乏有效的安全管控机制，从而陷入了具有双重性的安全困境和治理困境。从国际层面看，域外霸权国家对于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或视而不见，或继续制造新的麻烦，或以传统安全思维解决问题。美国惯常采取打压异己，组建与自己利益一致的同盟体系，这种安全同盟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排他性，在寻求同盟安全的同时将安全危机转嫁出去。特朗普执政后，在中东地区重塑安全体系，与以色列、沙特包括一些海湾国家形成同盟体系压制伊朗，对中东地区安全形成严峻挑战。从地区层面看，现有的安全合作组织如“海合会”、

“什叶派安全联盟”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排他性甚至是对抗性。从国家层面看，许多中东国家的安全建设有着突出的“外包”性质，比如沙特等海湾国家往往采取“安全靠美国、发展靠石油”的方式，通过购买美国军备或加入美国安全体系换取安全保障。然而，这种“安全外包”并不可靠，此前美国政府对于伊朗巴列维态度的转变就是前车之鉴。

王林聪认为，推进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思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加强自主安全能力的建设，摆脱“安全依赖”。目前中东国家建立自主安全的意识不够，更缺乏自主安全能力的建设。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叙利亚和也门、利比亚，这些面临重建的战乱国家首要任务应是安全重建，如果安全重建无法推进，其他方面的重建可能瞬间会归零。其次，要以发展促安全。从长远看，安全治理需要依托于可持续发展和自主型发展，目前中东国家自主型发展不足，由此导致安全没有依托。近年来一些中东国家认识到这个问题，提出再工业化，力求实现自主的可持续的发展，其中埃及是典型代表。第三，要以新安全观推动中东安全机制建设。新安全观是建立在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之上，唯有如此，其安全才能可靠、持久、有保障。

考虑到中东安全治理存在缺陷，中东安全治理的途径也应从国内安全、地区安全到全球安全三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从国内层面看，核心是重建安全秩序，其次是以发展促安全，重点要加强自主安全能力的建设，即战乱国家首先要加强安全重建，同时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应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确保政治安全。从地区层面看，要以合作促安全，摆脱“零和”思维，尤其要摆脱传统安全观的思维模式。从国际层面看，要重点加强安全危机的管控和协调，大国在这个方面责无旁贷。中东安全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常波及各国，形成外溢效应和连锁反应。因此，一方面应倡导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另一方面应以联合国为平台、发挥联合国的主渠道协调作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中东安全问题，推进中东安全机制的建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吴冰冰的报告题目为《中东地区战略格局中的伊朗》。

吴冰冰首先介绍了相关概念。他表示，“伊斯兰”（Islam）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表示顺从，是对伊斯兰教信仰的唯一的神安拉的顺从，信仰伊斯兰教的群

体就是穆斯林，意为顺从者。安拉还被汉译为“真主”，意为真正的主宰，这实际上包含着伊斯兰教内部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即苏菲主义的认知方式，也就是伊斯兰教内部的神秘主义。综上所述，伊斯兰世界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空间、群体、人的概念。此外，它可以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即由遍及亚洲、非洲及欧美的 57 个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同时它还代表着全世界穆斯林构成的共同体，目前全世界有 16 亿穆斯林，分布在超过 100 个国家。

中东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这种界定方式是一种认知上的权力结构，对中东的界定本身就意味着对它的一种控制方法，因此中东本质上是不明确的。对于中东国家的数量，有人认为是 16 个，从东边的伊朗，到西边的埃及，也即大家认为的一般意义上的中东。这种观点存在一些争议，比如阿富汗、塞浦路斯是否算中东国家？另外，对于大中东的概念也存在多种解释，因此，不确定性是中东概念的最大特点。

阿拉伯（Arab）是阿拉伯语单词，本意是游牧人，它描述的是在阿拉伯半岛游牧的生活方式。在阿拉伯人的概念中分为南阿拉伯人和北阿拉伯人，南阿拉伯人就是也门人，传统上定居在农业地区，而今天所讲的阿拉伯人实际上是北阿拉伯人，也就是沙漠中的游牧人。

伊斯兰、阿拉伯、中东三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比如伊朗人不是阿拉伯人，但他们是穆斯林，经常有媒体报道称“伊朗等阿拉伯国家”，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因此不能看到穆斯林就认为他们是完全没有差别的群体，这也体现了伊斯兰的多元性，包括民族的多元性，教派的多元性，国家的多元性等。

伊斯兰教主要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什叶派的本意是派别，逊尼派的本意是道路。伊斯兰教的先知是穆罕默德，他在公元 610 年创立伊斯兰教，由于他没有男性后代能够存活下来，在他去世之后谁有资格继承他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也是其所有男性后代的源起者，他最早加入伊斯兰教，参加了穆罕默德领导的所有战斗，其宗教经历和学识被大家普遍认可，也被认为具有继承穆罕默德的资格。在创立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人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处于贫穷闭塞的状态，创立伊斯兰教后开始对外扩张，短期内积累了巨额财富，阿里主张平均分配财富，拒绝早期的宗教权威拥有特权，而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宗教特权阶层出现，他们坚决反对阿里主导权力，其中艾

布·伯克尔、奥麦尔、奥斯曼先后成为哈里发（继承者），当他们去世后，阿里成为伊斯兰教权力的继承者。在伊斯兰教最初的四大哈里发中，除阿里之外的三人都是特权阶层的代表。逊尼派认为，四大哈里发代表了正统的伊斯兰教，而什叶派则认为阿里之前的三个哈里发都是篡权的，只有阿里才代表了伊斯兰的正统。因此后世的伊斯兰教就认为追随特权阶层传统的是逊尼派，追随阿里的是什叶派，这实际上也是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教领导权斗争的结果。然而这种斗争延续下去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在阿里去世后，什叶派产生了 12 个伊玛目（领导人），这与逊尼派认为的四大哈里发（继承人）形成了两套领导体系，逐渐形成了权力政治的两种系统或两套信仰体系，直到今天形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群体。目前，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占穆斯林人口的 10%到 20%，约 1.6 亿人到 3.2 亿人。从分布上看，伊朗是什叶派第一大国，约 7000 万人，此外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国也都是什叶派人口大国。近年来，什叶派在非洲发展的很快，其中尼日利亚什叶派在 30 年时间里从一个没有发展到 1000 万以上。

什叶派与逊尼派还存在结构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宗教教育制度和宗教学者的等级制度方面。什叶派的儿童可以去普通的学校进行国民教育，也可以去清真寺进行宗教教育，清真寺中附设宗教学校，从小学开始分成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初级教育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教的基本常识，之后学逻辑、伊斯兰教法渊源，到了高级阶段进行研修，类似于博士阶段，三个等级修习完毕大概需要 20 多年。在语言、逻辑、教法等知识体系基本搭建后，学生可以向老师申请毕业，由老师而不是学校颁发毕业证，这充分反映出什叶派认为知识需要得到权威的认可，这个权威是个人而非机构。在接受完所有的宗教教育后，学生的身份就发生变化，成为真正的宗教学者，宗教学者本身在伊斯兰教中是有特殊含义的，称为“乌勒玛”，他拥有教法的创制权，即对宗教经典中没有明确指出的问题做出结论，并且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在什叶派中，宗教学者是分等级的，初入体系时为最低等级，称为霍贾特伊斯兰，此后通过不断的研究，最终要围绕伊斯兰教法的一个问题作出权威性的解读，写出一本书，并接受同行评议，如果结论普遍被接受，霍贾特伊斯兰就能升级为阿亚图拉，称为“真主的迹象”，这个阶段大约需要 30 年时间。成为阿亚图拉后还要继续研究，写出一系列书，升级为大阿亚图拉。目前全世界大阿亚图拉约有 10 人，阿亚图拉约 100 人，霍贾特

伊斯兰约 7 万人。

根据什叶派的规定，阿亚图拉拥有教令发布权，每一个什叶派信徒应追随一个大阿亚图拉，在重大事项上必须征得大阿亚图拉的同意。此外，大阿亚图拉拥有“伍一税”权，即所有什叶派信徒要拿出年收入的 1/5 交给大阿亚图拉，虽然是纯自愿性质，但由于信徒众多，每年的收入数量可观。这笔钱可以用来给宗教学校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持清真寺的运转。由此可见，什叶派拥有较为完备的结构体系，既包含行政性的权力架构，也包含财富性的管理体系，这种高度的组织性是逊尼派所没有的。对于什叶派来说，政府或国家的存在是不会影响其内部高度的组织性的，即便在动荡时期，什叶派的发展也不会受到影响。此外，在国王与什叶派宗教群体发生激烈对抗的时候，这套体系也能发挥作用。在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时期，他试图打破这套体系，取消了所有宗教学者的权威，逼着阿亚图拉上街乞讨，最终却被 1979 年伊斯兰革命所推翻。总体上看，什叶派是一个具有内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并依托于宗教教育，拥有资源流动及内部输入输出的严密体系。

在介绍完伊斯兰相关概念及什叶派后，吴冰冰进一步梳理了伊朗的政治制度。据介绍，伊朗在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搭建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政治制度。最上层称为“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在波斯语中这个词原意是最高领袖，和汉语翻译中常常提到的宗教领袖、精神领袖没有任何关系。最高领袖必须是宗教学者，可以不是大阿亚图拉，但最终将升为大阿亚图拉，因此最高领袖本质上是政治职位，但一定要具有宗教身份。最高领袖是由 86 至 88 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专家委员会则由全民选举产生，四年一届，专家委员会在最高领袖换届时选举新的最高领袖。虽然最高领袖为终身制，但也有一些限制条件，比如专家委员会每年要开两次会，讨论的议题包括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是否有渎职、腐败的情况，以决定是否对其实行罢免，因此专家委员会也是对最高领袖的一种监督机制。由于专家委员会来自全民选举，而最高领袖又是由专家委员会选出，因此最高领袖的权力不仅来自于他对宗教知识的掌握，也来自于民众的充分认可。

最高领袖之下是总统，伊朗总统可以是任何身份，现任总统鲁哈尼是宗教人士，前任内贾德则是普通的世俗人士。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每四年一次，最多连任一届，历史上的伊朗总统基本上都能实现连任，执政 8 年。总统选举结果需

由最高领袖认可。在职责方面，最高领袖负责国家战略性决策，但不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因此他对总统的事务是不能直接干预的。伊朗议会同样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为四年，拥有立法权，同时被宪法监护委员会所监督制约。宪法监督委员会有 12 名成员，6 名宗教学者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6 名法学家由司法总监推荐，并由议会批准。在日常工作中，议会的立法是否违反了伊斯兰教的伦理价值观由 6 名宗教学者负责认定，而议会立法是否违宪则由 12 名委员共同认定，此外，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职能还包括对选举的候选人资格进行审定。宪法监督委员会和议会是相互监督的，类似于议会制国家的上议院和下议院。在伊朗司法系统中，司法总监为主要负责人，任期为 5 年，可连任一届，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

伊朗的政治体制涵盖全民选举、共和制、三权分立、立宪制、权力制衡，整套系统非常完备，形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也称为现代伊斯兰主义体制。伊斯兰主义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要在政治和社会中践行伊斯兰教的理论，而后者是要将这套理念和西方的立宪、选举、共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整合在一起，也可以称其为伊斯兰民主制，即伊斯兰加民主。西方共和民主体制的所有元素伊朗一样不缺，但他需要通过最高领袖、宪法监督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和司法总监将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反映出来；通过总统、议会，专家委员会的选举将共和体制反映出来。这套政治体制加上什叶派内在的高度组织化，使伊朗能够在中东地区实现超乎寻常的稳定，并成为地区强国。

派系政治是伊朗政治体制的一大特点，不同政治派别在政治结构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比如保守派，他们认为目前的体制很好，只需经过适当的调整就可以适应所有的问题，其代表是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自由主义改革派认为西方体制最好，伊朗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政治自由化，代表人物是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务实派代表人物是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他认为伊朗的政治体制有问题，但急剧的变革是危险的，因此倾向于改革派；在改革派和务实派之间还有务实保守派，代表人物是现任议长拉里贾尼；新保守派声称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代表人物是艾哈迈迪·内贾德。现任总统鲁哈尼属于全新的派系——温和派，他们认为所有派系都已固化，需要找到新的力量将所有派系的精英整合在一起。温和派强调团结所有人，拒绝有自己的班底，均衡使用所有派系。

在伊朗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职能是平衡各派系的利益。出身保

守派的最高领袖不是为了保守派争取大利益，而是要让所有派系利益最大，只有在所有派系平衡的基础上，伊朗的利益才能最大。因此当改革派出现问题时，哈梅内伊全力支持改革派，当改革派坐大的时候，他又支持保守派压制改革派。这也是伊朗政治体系的一个诀窍：在非常复杂的政治体系中存在非常复杂的派系政治，通过实现平衡中的平衡，保证伊朗在各种动荡中找到其最佳的稳定位置。

吴冰冰表示，伊朗在中东地区能够实现强大和稳定，绝不是因为它拥有核技术、导弹、航天技术等，而是在于几十年来它倾力搭建了这套完备均衡的政治体系和制度，保障它成为中东地区的超强国家。

在四位专家完成专题讲座后，现场学员针对讲座中的相关内容发表了各自观点，并就自己感兴趣的中东及中亚、俄罗斯问题向在场专家请教。在接下来的三天中，35名学员将经过笔试及讨论型面试最终决出6名优秀营员。